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

总主编 易胜宽 蔡震
本卷主编 何刚

卷十

历史卷 下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

卷十

历史卷 下

总主编 杨胜宽 蔡震
本卷主编 何刚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顾问

章玉钧 谢保成 谭继和
魏建 李怡 王锦厚
祁和晖 彭邦本 魏红珊

总主编

杨胜宽 蔡震

分卷主编

《总论卷》：税海模 蔡震
《史实卷》：廖久明
《交往卷》：廖久明
《思想文化卷》：陈晓春 王海涛
《文学·诗歌卷》：雷业洪 张昭兵 陈俐
《文学·戏剧卷》：陈俐 杨兴玉 何玉兰
《文学·小说、散文、中外文学比较卷》：陈俐 邓芳
《历史卷》：何刚
《考古、古文字卷》：陈仕益 杨晓宇
《教育、新闻出版、书信、书法卷》：廖久明 熊泽文 王立新
《研究之研究卷》：税海模 蔡震

其他参与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天乐 于立得 万保君
邓帮云 令狐兆鹏
陈大川 杨宏 李畅
余玲 张远东 苟兴朝
罗春 赵学彬 徐立昕
唐瑛 卿玉强 龚盖雄

凡 例

一、本汇要收录郭沫若研究文献的时限为 1920 年至 2008 年。

二、本汇要收录的是国内发表的研究郭沫若的代表性文章；考古、古文字方面的回忆文章，如包含有不可或缺的评论文字，则予节录收入。

三、本汇要优先选择具有原创性和史料性价值的文章，后来发表者如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则酌情选录。

四、郭沫若研究的重要著作按存目处理，其他著作中与郭沫若研究有关的章节均按单篇文章处理。

五、同一专题的文章以发表先后为序集中编排（“史实卷”则以相关问题的时段性为序编排）。

六、为了全面反映 90 年来郭沫若研究的总体状况，凡符合以上标准的文章都在入选之列，以期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各种学术观点。

七、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文献的本来面目，反映其时代特征，仅对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更改：（一）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二）脚注、尾注、参考文献统一置于篇末；（三）明显错误的字词、标点符号等。

目 录

《甲申三百年祭》

纠正一种思想	《中央日报》	3
论赫尔的名言	《商务日报》	6
论责任心	《中央日报》	8
转载《甲申三百年祭》编者按	《解放日报》	10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	叶 青	12
评《甲申三百年祭》	姚雪垠	23
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 ——与姚雪垠同志商榷	顾 诚	50
《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	王守稼 缪振鹏	69
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风波 ——驳《评〈甲申三百年祭〉》	王锦厚	86
李自成悲剧的再反思 ——评《甲申三百年祭》的贡献和局限	孙达人	105
应当如何评价《甲申三百年祭》	叶桂生	122
一篇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史学论文 ——纪念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 60 周年	朱佳木	133

古籍整理

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叙录”之商榷	王欣夫	141
对《管子集校》及所引各家注释中有关《轻重》诸篇若干问题之 商榷	马非百	166
郭沫若校订《盐铁论读本》质疑十例	刘光胜	187
郭沫若古籍整理的特色与成就	谢保成	193
郭沫若与中国方志	诸葛计	205

综 论

郭沫若——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	卞 哲	215
“只顾攀登莫问高” ——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侯外庐	233
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	黄 烈	241
论郭沫若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	周朝民	257
郭沫若史学成就优于文学成就	谭继和 祁和晖	267
郭沫若和比较史学	王 徽	281
郭沫若在史学研究中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取向	罗福惠	295
早期郭沫若的史论	叶桂生	311
郭沫若、廖平与今文经学	税海模	325
扬弃旧史学 创建新史学 ——郭沫若对胡适、古史辨史学的扬弃	杜蒸民	337

郭沫若早期的史学思想及其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林甘泉	353
郭沫若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黄烈	374
郭沫若治史的个性特色	刘茂林	394
史学理论的建树与追求		
——为纪念郭沫若诞辰百周年而作	叶桂生	415
郭沫若史学的时代精神	陈其泰	429
论郭沫若的史学体系	田昌五	448
郭沫若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田居俭	461
世纪回眸：郭沫若古史研究特色的几点思考	彭邦本	467
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	余英时	475

《甲申三百年祭》

纠正一种思想

《中央日报》

在全中国的人民以血以泪以汗苦战七年，并且最后胜利业已在望的今日，却还有人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我们不能不在此吁请中国人而忠于中国者，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一个民族既发动了民族战争，民族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期待并力争战争的胜利，然而这一种思想却必欲战争归于失败，且不至于失败而不止。

没有一个国民愿意亡国，而这一种思想却努力为了亡国主义作辩护，作鼓吹。

我们中国五十年来，是在以革命来建国。我们中国七年来，更在以抗战求复兴。然而这一种思想却到处以亡国的历史，加以渲染，加以曲解，要低落我们发扬振作的民气，要转变我们一往直前的士风，要散布悲观的种子，要造成空虚的幻象，使一般人士离开现实的抗战阵营，作亡国以后的呻吟和悲愤。

这种心理之变态虽可诧异，然而中国抗战是必胜的。假如他期待内忧的发展，期待外患煎逼，以发泄他一腹牢骚，不是居心难问，就是时代错误。然而失败的是他们，不是中华民族。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一部悠长的历史上面，有败国和亡国的教训，也有复国和兴国的先例。而败国亡国的历史教训，教训我们说：内忧外患互为策应，每每演成亡国的惨剧。所以我们五十年国民革命与七年抗战，最大的努力就是要打破那内忧外患的连锁。中华民国就是从内忧与外患互为连锁的悠长过程里面，打出了这一条血路并且找出了光明的前途了。

爱国的历史家，对于我们历史上内忧外患互为策应以致亡国的事例，自有其不磨的公论。公元三百十一年，中国有永嘉之乱，蔓延山东河南的流寇，以

王弥为首领，与侵入中原的羯胡石勒的军队，互相策应，颠覆了中国的政府。爱国的历史家并不歌颂那一个与石勒会师的王弥。爱国的历史家却歌颂那主持淝水之战的谢安，指挥淝水之战的谢玄。

十二世纪之中，沿海一带的流寇，以李全为首领，勾结金兵，扰乱中原。爱国的历史家称赞过精忠报国的岳飞，称赞过采石之战的虞允文，却并不单把那策应金兵的李全挑了出来，加以宣传和鼓吹。

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假如是一个爱国的历史家，就应当称道熊廷弼、史可法、瞿式耜、以至于何腾蛟，决不会偏偏寻出李自成，及其部下李岩，作为歌颂夸扬的偶像。

爱国家，爱民族，不肯亡国，不愿灭种，这都是人类的常理常情。而今另具眼光的一种思想，发而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那里歌颂王弥和李全这一脉相承的流寇李自成和他的部下李岩。这实在是出于人类常理常情之外！

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信徒吗？恩格斯在其所著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书里，盛称一八四八年巴黎公社，一方面发动了社会革命，一方面到处标出“杀死强盗”的口号。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

无疑的，这不啻是在民族复兴的关头，鼓吹着悲观的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要把一股士气和民心，导入一种牢骚怨恨的境地，以至于脱离现实的抗战阵营。

然而郭沫若是徒劳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全中国人民今天在三民主义的党和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作战，而且决心作战到底。并且在抗战之中，实行建国，解决我们的困难和弱点。外患内忧可以颠覆明朝，却不能摇动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和革命政府。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可以颠覆明朝，却不能摇动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和政府。昧于这个事实的人，必受到历史的嘲笑。

我们的国家民族经过了五十年来革命建国和七年抗战复兴的过程，向光明的前途而迈进。回想这五十年革命和七年抗战的过程里面，一切的阻碍，无论是客观的反动行为，或是主观的诬蔑言论，莫不一一粉碎于祖国爱和民族感的面前。像郭沫若这种败战亡国的思想之残渣，我们断定他必被冲灭于抗战的洪流之中，然而爱中国的中国人却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思想听其谬论流传，也是不待说的。

（原载《中央日报》，1944年3月24日）

论赫尔的名言

《商务日报》

美国务卿赫尔，对于言论自由的颂赞，已成为世界共同的归趋，我们愿意趁这机会，对这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见解。“言为心声”，一个人心有所思，一定表之于言词，正如一个虫或鸟，对气□有所感应，一定或鸣或舞。□于这种自然的感应，我们无法加以抑制，抑制的结果，一定是非常的反感。古语说“不平则鸣”正是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对于当前的检查尺度，认为有改进的必要。当然，现在是战时，可以泄露国防机密的文件，都须绝对秘密。不过次要的东西，例如已修成的公路，物产的数字，各地的行情，似乎没有一律秘密之必要。尤其是许多已成史料的事情，更应早日公诸大众。若果一律检扣，必无以服众心，而结果弄到报章杂志，千篇一律，尽是呆板的公式，笼统的纪录，也不是宣传的道理。讲到效果，则人们在公开发行的大报上，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向许多秘密出版的刊物求知，偷偷摸摸的看，偷偷摸摸的辗转传述，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呢？

因此，我们对于赫尔国务卿对于言论自由所提出的主张，表示十二分的欣慰。不过我们不能不有几种修养，我们然后可以希望能享受这许多的自由。

第一，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认得这个时代。自由是不能让时代错误的人享受的。能够认清时代，才能领导群众。假如说圣哲是先知先觉，我们当新闻记者以及执笔的文化斗士，起码应该是后知后觉者。而时代错误的人，则连不知不觉者的限度都没有达到，如何能享受自由。英国是最讲言论自由的国家。罗素在英国与在世界，都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他又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但是在上次欧战的时候，罗素曾经发表了反对战争的言论，内容完全是依据他平日的学说与悲天悯人的一贯思想，但是英政府就请他下狱。为什么缘故？因为他是时代错误了。时代错误的人，不但自己的思想欠健全，并且还影响他

人，为谋社会的健康，对于这种人的思想，不能任其随便的传播。比如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在期待反攻，心灵中充满的，是无比的热忱，坚强的信念；而有人写出《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进社会内层。这种文章是时代错误的结晶，放任这种文章在社会散播，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事情。

第二，我们要享受这种自由，一定要对国家有浓郁的情感。举例说吧：爱国家胜于爱自己，因此在宣传当中，对于国家的好处，就尽量宣传，对于国家的弱点，我极力不让外面知道。这本是“隐恶扬善”的古训，而尤以在战时，对国家为然。如果不能这样，那么，国家就应当用制裁的手段，加以制裁。如果不是这样，当政的人，就是对国民不能负责任。美国是最崇尚言论自由的人，但是对于战报，美国人的传播，都有一定的时间，不能任意事先发表。但是在我国今天，偏偏有一班人，专门拿暴露国家的弱点为能事，任何不能发表的消息，他们都设法走漏出去，在外埠发表。以前香港，上海，是这种消息的尾闾。现在他们就藉与外人勾通，来把不利国家的消息传播。对于这种人，我们能够让他们享受战时的言论自由吗？

就上述尺度而论，我们中国的检政，毋宁较英美更为宽容。我们所以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检政当局，今后务其大者远者，同时更须齐一标准，毋使参差。另一方面更盼大家公开策励自己，反省自己，是否违背上述享受言论自由的条件。

（原载《商务日报》，1944年4月1日）

论责任心

《中央日报》

如果问中国政治怎样才上轨道，我们的答复是：大家对于政治都有责任心，政治就上了轨道。如果一个人，他在心理上总以为国家不是他的国家，政治不是他分上的事情，他就没有资格指斥国家不够民主，政治不上轨道。

一个人要谈政治，就要先把自己搁在里面。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生死，没有一个人能够旁观。他要把自己搁在事外，以旁观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生存，我们就要问他说：国家亡了，民族死了，你又走到哪里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重视自己对国家和政治的责任心，无论自己在位或是不在位，总有这一份责任心。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说：“环顾一身无可忧，忧必在于天下。”这都是这一份责任心的表现。最沉痛的是孙夏峰对于论语“士而怀居”一段的解释。他的大意是说：假如一个士，时安则人仕而有利禄，时危则高蹈而有声名，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孙夏峰所指责的，就是对国家和政治没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

要是不把自己搁在里面，放眼旁观，侈口清谈，则真有如□国父所说：“天下事一无可为。”国家政治真正是一无可为吗？今日敌寇不但叩门，而且深入国境。国家民族即令无可为，也要为，何况今日中国正在大有为之秋。

我们是在于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期。我们是在抗战达于艰苦的关头。我们是在建国正在开始的阶段。我们面前有许多历史遗留与社会潜在的弊病或缺点。我们不能够对这些弊病和缺点旁观，我们要把纠正这些弊病和缺点引为己任。如果缺乏这一份“引为己任”的责任心，当然可以放眼旁观，侈门清谈，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殊不知今日中国，要完成国民革命，要支持抗战至于胜利，要努力建国达于成功，正需要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一份做好，换句话说，正需要每一个人都尽他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心。

由于一部分人士责任心的缺乏，于是就有一种决不至于流行而竟然流行的思想，这就是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文学、戏剧、史论，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假如大家都是一味的呻吟感叹，把战意和斗志馁了下来，那在叩门入室的敌寇及其奸徒，真是正中下怀了。

我们要维护革命抗战建国的气概和志节。我们首先要唤起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政治的责任心。前方的战士，后方的生产者 and 运输者，都在日夜以血汗报答国家，何地何时容许一个知识分子作无责任的旁观与清谈？何地何时更容许一个知识分子发无责任的怨望和牢骚？我们要求他把自己搁在国家和民族乃至于政治的里面，油然而发生一份责任心。

民主政治乃是责任政治。毫无责任心的人，决没有能力使国家够民主，政治上轨道。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然而我们今日只是要唤起一般知识分子的责任心。我们重复地向他们申说：今日国家民族即令无可为，也要为，何况今日中国正在大有为之秋？我们更特别要求他们认识今日中国是在国民革命尚待完成，抗战尚待艰苦的努力，建国尚待真正的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正需要每一个人都尽他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心。

（原载《中央日报》，1944年4月13日）

转载《甲申三百年祭》编者按

《解放日报》

郭沫若先生这篇名震一时的文章，原发表于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因为最近才收全，到今天才能在这里转载。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不过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还在替日本主子服务）。李自成的部下，后来继续抵抗清兵，他的侄子李过还被明隆武帝赐名赤心，永历帝封为兴国公侯。这些事实，当然是那群歌颂满清曾胡的战败亡国主义者所不敢提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没有去想着居然有以吴三桂阮大铖自拟的人们来向他狂吠一通，而且居然还抬出恩格斯，说什么“恩格斯在其所著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书里，盛称一八四八年巴黎公社，一方面发动了社会革命，一方面到处标出‘杀死强盗’的口号。”可怜可怜！一下子就暴露了三种愚蠢：第一，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一部什么书？他难道不是比郭沫若更热烈地赞扬了十六世纪德国的李自成李岩，更热烈地攻击了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叛徒马丁路德么？第二，在世界历史上有过什么一八四八年的巴黎公社？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哪一章哪一节讲过这个怪物？第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第一版序言中确是说过：“法国工人在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在许多房屋上写着……杀死盗贼！并且枪毙了很多，他们干这件事，不是出于保护财产的热心而是正确